

徐安伦 张二京

试论郑观应由买办 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思想基础

郑观应(1842—1922)①,是近代中国由买办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著名人物,也是近代中国思想界有较大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。对于郑观应之由买办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过程,学术界许多专家学者已作过深入研究,但是对其转化的思想基础的研究尚不深入。本文试图就此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。

郑观应生活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,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进程,他的一生大体上经历了充当外国洋行的买办,而后投身于洋务运动,最后转化为民族资本家这三个历史阶段。正如他自己符合实际的概括:“初学商战于外人,继则与外人商战”②。

郑观应是广东香山县的一个小知识分子,因为“小试不售”,十七岁时“赴沪学贾”③。起初投靠其叔父郑秀山,尔后经曾寄圃和徐润的保荐,受雇于宝顺洋行。1868年,宝顺洋行停业,他被和生祥茶栈雇为通事,不久便承办该茶栈,获利颇多。于是,他将这一时期积累起来的资本,投向英商公正长江轮船公司,被洋商推举为该公司董事之一,兼做荣泰驳船公司生意。1871年,和生祥茶站停业,他又改任扬州宝记盐务经理。1874年,他受英商太古洋行雇用,为该行

开办轮船公司,任总经理兼管栈房,并沿江各主要商埠,开设为太古洋行服务的太古昌揽载行,同时还 在牛庄、汕头各口开设“北永康字号”,采购关东豆货,运往汕头,转向香港出口贸易④。为了吸收社会游资,他还在上海开设了恒泰钱庄⑤。直到1882年4月初,郑观应正式脱离太古洋行,才结束了他历时二十二年的买办生涯。郑观应在其买办活动中,充分发挥了他的才干,因而倍受外国雇主的青睐,实际上他为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起了桥梁作用。

当郑观应还在洋行充任买办时,他就已经参与了洋务主持的“官督商办”的活动,如参与上海织布局的创办,担任上海电报局总办等。他之所以参加洋务活动,一是由于他与北洋集团一些官僚有私交,二是由于他的精明强干早就引起了洋务派头子李鸿章的重视。所以,当1882年郑观应与太古洋行的合同即将期满时,李鸿章通过唐廷枢、李金镛等人转告,希望他脱离太古洋行,参加轮船招商局的工作。当时,虽然他心情十分矛盾,但经过一番斗争后,终于在这年四月脱离了太古洋行,进入上海轮船招商局任会办。至此,郑观应已不具备买办身份,而成了经办洋务企业的重要人物。这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。尽管人们对洋务运动的

评价不一,但郑观应投身于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企业,毕竟是一大进步,并且成为他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重要条件之一。

郑观应在参与洋务企业的经营后,对采用什么形式经办企业有过不同的主张:先是积极拥护“官督商办”,有时主张“中外合办”,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,他亲身体会到“商办”才是有利于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途径。因此,他在企业中竭力代表和维护商股的利益。不仅如此,他还把自己积累起来的资本投向近代企业,在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许多企业中,都有他的投资。他积极主张商办和对民族资本企业“无不入资相助”^⑥的行动,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表明他已经完全转化为民族资本家。

在近代中国历史上,有的买办或商人积累起了财富,他们并没有把这些资本投向近代企业,而是把资金转向农村购买土地,成为新的财东。郑观应则不同,他不仅投资于近代企业,而且还利用自己在企业界的威望大量招商集股,在经营的企业中维护民族利益和商股利益,逐步具备了民族资本家的性格。那么,郑观应由买办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呢?

第一,郑观应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热烈的爱国情感。

在论述这个问题时,我们首先需要分析他走上买办道路的背景。香山县离广州很近,鸦片战争前后都是通商之地,所以许多人都成了当时的买办,香山亦称为“买办之乡”。郑观应的叔父、大哥和一些姻亲都是买办,受这些人的影响,家境贫寒的郑观应奉父命投奔亲友,这说明郑观应是在特定的环境下选择了买办这一职业的。

郑观应在外国洋行充任买办期间,逐步认清了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罪行。对于中外贸易上的不平等,郑观应极为愤慨:

“外国税华货进口甚重,中国税洋货进口求其轻,华人商于西国者,按名纳款,岁有常规,洋商于中国者并无此费”^⑦。郑观应后来为《盛世危言》作序时曾回忆他青年时代的心情:“庚申之变,目击时艰,凡属臣民,无不眦眦”^⑧。面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,青年郑观应气愤到了“眦眦”的程度,说明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热烈的爱国情感在他身上占着主导地位。

正因为他“愤彼族之要求,惜中华之失策……感激时事,耿耿不能下脐”^⑨,所以产生了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。他认为,要挽救民族危机,“防外侮重于防内患”^⑩。在他看来,要做到自强,首先要兴办实业,以便同外国列强展开商战。因此,当洋务派以“自强”和“求富”名义办起洋务企业时,他认为是救国的好办法。

第二,郑观应具有发展民族经济、以商战对商战的思想。

郑观应认为:“欲安内攘外,亟宜练兵将,制船炮,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;讲求泰西士、农、工、商之学,以无形之战以固其本”^⑪。这就是说,欲御外侮,必须形战与心战并举,但相比之下,心战更为重要,因为“兵之吞祸人易觉,商之掎克弊固无形。我之商务一日不兴,则彼之贪谋一日不辍”。^⑫“与外人通商,无形之侵伐也,吃亏之处比割地岁币尤甚。谋国者而不思所以御之之法,如之何其可也?”^⑬所以,郑观应强调“习兵战不如习商战。”^⑭

为了发展民族商品经济,郑观应首先强调生产资料的生产。他说:“论商务之厚,以制造为急,而制造之法,以机器为先,……宜设专厂制造机器”^⑮。说明他认识到了生产资料的生产对于商品生产的决定意义。他曾说:“农牧为工本,工是商之母”^⑯。这表明,他比较明确农业、工业、商业之间

的关系。虽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,他不可能作出“生产决定流通”的理论概括,但已具备了这种朴素的思想。由此,他在强调“决胜于商战”时,尤其要“以工翼商”,使工业成为商业的后盾。

为了发展民族商品经济,他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,以提高民族工业产品的质量。“夫欲制胜于人者,必知其成法,而后能变通,能变通而后能克敌。”^{①⑦}郑观应认为西方“萃数国之人才,穷百年之智力,掷亿万之资财”^{①⑧}得来的“成法”,中国人完全可以接收过来为我所用。他还以日本向西方学习而强盛起来为例,说明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。由此他提议翻译西方有用的书籍,颁行于天下,广设书院,使“人人皆得而习之”^{①⑨}。

上述表明,郑观应从强烈的爱国情感出发,积极主张发展民族商品经济,与外国侵略者决胜于“商战”,以达到自强救国的目的。正因为他有这种思想基础,所以他寄希望于发展民族企业,因而他由买办向民族资本家的转化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。

第三,郑观应在经办近代企业的实践中,逐步产生了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。

值得人们深思的一个问题是,为什么郑观应在结束买办生涯、投身于洋务运动之后,又站到了民族资本家的立场上?回答是这样的:社会心理学的群体原理认为,一个人归属于某一群体,是因为他的思想与群体思想体系在认识上的基本一致,而他脱离某一群体,则是二者发生冲突和矛盾的必然结果,依据这一原理,我们认为,郑观应的最终转化,是他在实践中逐渐产生了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。

首先,郑观应发现凡是冠以“官”字的企业,都存在着封建衙门式的管理、贪污中饱、安插亲信、人浮于事等严重弊端。由此

他得出结论:“官督商办”不仅不能护商,反而是“病商”。他在《商务》中指责“官”对近代企业“但有困商之虐政,并无护商之良法”^{②⑩},“未能惠工恤商”^{②⑪}。因此,他对各种形式的官办企业失去了希望。

失望之余,郑观应认为,由民间设厂,改归商办才是上策。他在《船政》篇中写道:“开矿之事,似宜商办,而官为持”。所谓“官为持”,就是官要为商服务。他还向清政府建议:“凡通商口岸,内省腹地,其应兴铁路、轮船、开矿、种植、纺织、制造之处,一体准民间开设,无所禁止。或集股、或自办,悉听其便。全以商贾之道行之,绝不拘以官场体统”^{②②}。这一建议,既大胆又彻底,是郑观应自由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思想的系统反映。

其次,郑观应认识到,要发展民族工商业,必须实行政治改良。在这个问题上,他与李鸿章等人发生了尖锐分歧。李鸿章等人坚决维护“三纲五常”的伦理道德,认为封建专制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而郑观应则通过洋务运动的实践,得出了“政治不改良,实业难兴盛”^{②③}的结论。为此,他提出在中国设立议院的主张,“苟欲安内攘外,君国子民持公以永保太平之局,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!”^{②④}。他指出,在美国、日本实行君主立宪都有明显的成效,在中国“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?而犹谓中国尚不可亟行哉?噫!俱矣!”^{②⑤}郑观应改良政治的主张,意在为发展民族工商业鸣锣开道,是其自由发展资本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。

第三,在对外关系上,郑观应要求改变“守订和局”的政策,维护民族尊严,维护民族经济利益。洋务派官僚是主张“守订和局”,承认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,维护列强在华权益的。他们认为中国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政策应该是“忠、

信、笃、敬”。曾国藩认为，“显违条约，轻弃诺言，而后为失信也。即纤悉之事，^{②6}颊笑之间，亦须有真意。”^{②6}具有爱国情感的郑观应，他对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给予了坚决谴责。因而他主张重订条约，以维护民族权益，为自由发展民族商品经济求得平等竞争的条件。

第四，郑观应最终与洋务派群体相脱离，还由于他与洋务派官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不同。李鸿章等人是清朝的封建大臣，洋务运动的实权派；而郑观应除了其企业家的属性外，又属于洋务知识分子的群体，突出的是他的理论建树。李鸿章等人身居显位，思想的总趋势是稳定和保守，郑观应的地位却相对卑微，他有感于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，著书立说，探寻着救国救民的方法，思想具有活泼性和开放性；李鸿章等人西学知识贫乏，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，很难冲破封建传统思想的樊篱；而郑观应在与外国人的接触中，积累起了较丰富的西学知识，并逐步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思想。于是，郑观应便和洋务群体规范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冲突，导致最终和洋务派分道扬镳而转化为民族资本家。

上述说明，郑观应在实践中形成的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，与洋务派的群体规范相矛盾，结果便促成了他的完全转化。

第五，郑观应接受了“变易”的哲学思

想。

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”，这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家的著名命题。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，郑观应接受并形成了“变易”的思想。他在《盛世危言》的自序中指出：“易曰‘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’。虽有智慧，不如来势；虽有磁基，不如待时。”^{②7}在《论公法》篇中，他指出，“夫天道数百年大变，数十年小变”^{②8}等。

由此可见，“变易”观念构成了郑观应认识事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。既然郑观应认为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随着时势的不同而在不断地发生着“变易”，那么，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，郑观应由买办而投身于洋务运动，最后又转化为民族资本家，从而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行为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注：

(1) 关于郑观应的卒年代，在史学界说法不一。这里采用夏东元的说法。见夏东元：《晚清洋务运动研究》第227页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。

(2)(4) 郑观应：《盛世危言后编》第8卷，第42页。

(3) 转引自夏东元《晚清洋务运动研究》第279页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。

(5) 郑观应：《盛世危言后编》第10卷，第

王谷良

关于卢梭评价的几个问题

让·雅克·卢梭是十八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，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。他的思想对法国大革命起过重大的指导作用，对后来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有很大影响。本文拟对卢梭的生平和政治思想中的几个问题，谈点自己的看法。

治者同流合污。这些情况，本应激起人们的同情和钦敬，但有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却借此攻击卢梭是“假禁欲主义”^①。让我们简述一下卢梭的生平，以弄清事实的真相。

卢梭出生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，自幼丧母，十岁时，父亲被迫离家出走。卢梭从小过着寄人篱下和漂泊无定的生活。十三岁起，他在一个性格暴戾的雕刻匠店里当学徒，受尽了惩罚和折磨。他酷爱读书，手不释卷，常被师傅窥见而遭受毒打。十六岁那年，他因不堪虐待，终于弃职而逃，开始

卢梭的一生坎坷不平，经历过长期流浪的生活。成名以后，仍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，始终保持独立不羁的人格，不与封建统

[illegible]

(6) 郑观应《稟唐少林中丞移民开垦事》，见《盛世危言后编》第7卷。

(7) 郑观应：《交涉》，见《易言》二十篇本第11页。

(8) 夏东元编：《郑观应集》（上）173页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。

(9) 郑观应：《盛世危言自序》。

(10) 郑观应《民团》附论,《盛世危言》第5卷。

(11)(12)(13)(14)夏东元编：《郑观应集》(上)第595、586、592、586页。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第1版。

(15) 郑观应：《盛世危言三编》《商务五》

(16) 郑观应：《罗浮待鹤山人诗草》。

(17)(18) 郑观应,《易言、西学》。

(19) 夏东元编,《郑观应集》(上)第242

页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第1版。

(20) 郑观应：《商务》篇，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第3卷第6页。

(21) 转引自张国辉：《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》第362页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。

(22) 郑观应：《盛世危言增订新编》第3卷第8—9页。

(23) 郑观应《盛世危言后编，自序》。

(24)(25)夏东元编：《郑观应集》(上)第317、314页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。

(26) (美)费正清:《剑桥中国晚清史》下卷,第191页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5年第1版。

(27)(28) 夏东元编,《郑观应集》(上)第233、66、页。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2年第1版。

(责任编辑 辰 丛)